



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评论

工商管理评论

Business Management Review

主编 / 李俊清

执行主编 / 张秀萍

第1辑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评论

工商管理评论

Business Management Review

主 编 / 李俊清

执行主编 / 张秀萍

第1辑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hina Minz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工商管理评论. 第1辑/李俊清主编. -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6
ISBN 978 - 7 - 81108 - 996 - 7

I. ①工… II. ①李… III. ①工商行政管理——文集
IV. ①F203.9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82466 号

工商管理评论(第1辑)

主 编 李俊清
执行主编 张秀萍
责任编辑 杨爱新
封面设计 布拉格
出版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张:15.75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08 - 996 - 7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李俊清

为实现既定目标而进行有组织的群体活动，是人类社会的根本属性之一。因而，管理思想及其实践，已经有了漫长的发展历史。但把管理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系统的研究，却还只是近百年来的事。上世纪初叶，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的名著《科学管理原理》（1911年）以及法约尔（H. Fayol）的名著《工业管理和一般管理》（1916年）相继问世，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管理学时代的开启。

今天，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科技创新与制度变迁产生一系列的重要成果，正在迅速改变着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全球化浪潮惊涛拍岸，冲击着世界每一个偏僻的角落；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把原来彼此隔绝的个体编织成为同一网络中密切关联、频繁互动的节点；航天科技前所未有地拓展了人类的视野；而基因工程则使生命形态更加完善……然而，人类在享受着文明进步成果的同时，也面临着全球气候变暖、资源短缺甚至枯竭、持续不断的冲突与战乱等共同的威胁。

管理的本质在于通过使群体活动协调有序而使人类生活更加美好，因而，全球治理、国家管理、企业管理、社会各领域的管理是否有效与科学，就成为关乎人类命运、国家兴亡、企业盛衰、民众福祉的重要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认为：“在人类历史上，还很少有什么事比管理学的出现和发展更为迅猛，对人类具有更为重大和更为激烈的影响。”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2010年，中国以近5.8万亿美元的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出口总额、外汇储备，原煤、粗钢、汽车、电脑、手机等产量均居世界第一，快速崛起的东方巨人正以全新的风貌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

然而，中国地域辽阔，区域发展不均衡，始终是困扰我们的诸多问题之一。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占到了国土面积的64%，却由于诸多因素的限制，依然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2009年，民族地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5.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2.9%，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2.4%。尚有1955万农村贫困人口，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总数的54.3%。

民族地区在整个国家的发展格局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没有占西部地区

总面积 90% 以上的民族地区有效开发，就谈不上西部大开发的成功；没有占国土总面积 64% 的民族地区的发展，就谈不上全国的发展；没有 55 个少数民族的小康，就没有国家的全面小康。

而改变民族地区的落后状况，实现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需要政府、市场、社会等众多方面协同努力。

市场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但民族地区市场主体发育依然不够健全。首先，民族自治地方企业数量相对较少。截止 2008 年，我国少数民族分布最集中的八个省区（五大自治区加上青海、贵州、云南三省）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总数 18779 家，占全国的 4.41%。其次，企业规模小、产值低。八民族省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 29861.67 亿元，只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的 5.88%，仅相当于广东一省的 45%。再次，企业竞争力不强。在每年一度的全国科技企业 100 强和《福布斯》中国企业创新 100 强评选中，民族自治地方一直没有企业能够入选。在 2010 年全国企业 500 强中，八个民族省区一共只有 25 家，只占总数的 5%，其中宁夏、西藏两个自治区均没有企业入选。同时，由于人才资源大量外流，民族自治地方企业的经营管理缺乏优秀人力资源支撑，运营效率也相对低下。企业作为市场中商品的供应者和重要的消费者，是支撑一个地方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民族自治地方企业的弱势地位，使得民族自治地方市场主体竞争力很弱。而另一个重要的市场主体——作为消费者的的社会成员，在民族地区也存在着消费能力有限的问题。2008 年，民族自治地方人均 GDP 15457 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2890 元，农牧民人均纯收入 3369 元，分别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68.38%、81.68%、70.77%，民族自治地方社会消费能力明显偏低，又进一步制约了当地企业的发展空间。

民族地区市场发育程度不足。第一，民族地区市场化程度偏低。在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 2007 年中国各省区市场化程度指数的排名中，八民族省区排名最靠前的内蒙古自治区也仅排名第 20 位，其他省区依次是广西第 21 位，云南第 24 位，宁夏第 25 位，贵州第 26 位，新疆第 28 位，青海第 30 位，西藏排名最后。八民族省区都有大量农牧区，目前大多还处于自然经济状态，不论是政府力量还是市场力量，在经济领域的作用都还非常薄弱。第二，民族自治地方市场的产业选择与企业成长促进作用相对较弱。由于市场化程度不高，民族自治地方市场机制对于本地产业选择和企业成长的促进作用明显不足。目前完全依照市场机制调节而进入民族自治地方发展的外部资本，大多集中于资源开发领域，资本密集度高、环境友好程度低、吸纳就业能力不强。虽然这些资本的涌入对于民族自治地方 GDP 总量的增长有显著的拉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使一部分人的收入有所提高，但其负面作用也非常严重，甚至从长远来看可能有损民族自治地方的核心竞争力。有不少民族自治地方目前已经出现经济畸形发展的倾向，特别是在一些资源富集地区，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企业扎堆，在为地方推高 GDP 数值的同时，却

使得当地居民的生活受到严重损害。相反，那些对于民族自治地方市场环境改善和民生状况改良作用显著的企业，多为由国家兴办的国有企业或由集体组织兴办的集体企业，这些企业在民族自治地方的活动其实并不完全遵照市场机制的要求运行。

民族地区支撑市场运行的社会基础薄弱。第一，民族自治地方区域竞争力相对偏低。2010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2008~2009）》蓝皮书显示，八民族省区的经济综合竞争力排名，除内蒙古最高为第 10 位，处于上游区外，其他 7 个省区都处于下游区，排名先后依次是新疆第 24 位、宁夏第 25 位、广西第 26 位、云南第 27 位、青海第 28 位、贵州第 29 位、西藏第 31 位。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是指一个省（市、区）域在全国范围内对资源的吸引力及对市场的争夺力和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力、带动力，其具体衡量指标包含 1 个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一级指标，9 个二级指标即宏观经济、产业经济、财政金融、知识经济、可持续发展、发展环境、政府作用、发展水平、科学和谐发展，每个二级指标之下再设置 25 个三级指标，分别由经济实力竞争力、经济结构竞争力、经济外向度竞争力等组成。在综合竞争力偏低的情况下，如果完全由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那么民族自治地方无疑将成为资源外流区域和经济附庸，根本难以自主决定本地方的发展。第二，民族自治地方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缺失较为严重，难以以为市场运行提供良好的平台。即使是最彻底的“自由放任”思想的拥护者，都不能否认要使“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作用，需要政府为社会提供一定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并且随着社会发展进程的加快，这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内容也会不断增加。然而，民族自治地方目前在一些关键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供应方面，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缺失，进而使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受到诸多限制。例如在交通基础设施领域，民族自治地方公路、铁路密度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 1/2，且主要公路、铁路干线的等级较低，运力很弱，这导致了民族自治地方常常出现内部人员、资源出不去，外部人员、资源进不来的状况。在基础教育、通讯基础设施、公共文化服务等领域，民族自治地方也与全国平均水平存在很大差距，民族自治地方人均受教育年限比全国平均水平低接近 1 年，在就业人口中受教育情况中，八民族省区除了广西和新疆外，其他省区未受教育人口的比例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贵州、云南、青海、宁夏的比例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2—2.5 倍，西藏的比例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6 倍，有 44% 左右的劳动人口未接受过正式教育。而接受过大学以上教育的劳动力人口，八民族省区则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劳动人口受教育程度低，再加上通讯基础设施覆盖率、公共文化设施覆盖率也都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导致民族自治地方各族群众在获取信息、提升自我发展能力等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因而，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作用所要求的“充分信息”条件也很难具备。

要有效发挥政府、市场、社会各个主体的作用，关键在于提高管理能力。因此，民族地区政府管理、企业管理、社会管理的研究，不仅具有拓展学科体系的理论功能，更担负着指导民族地区实践的重要使命。20 世纪以来的 100 多年，是管

理学发展的黄金阶段，古典学派、行为学派、社会系统学派、决策理论学派、系统管理学派、经验主义学派、权变理论学派、管理科学学派、组织行为学派、社会技术系统学派、经营管理学派等，异彩纷呈、争奇斗艳，管理学研究已经步入了“理论丛林”时代。但是，要判别一种理论的有效性及其适用范围，最根本的标准，还在于其与所指导的实践状况是否契合。中国民族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和特点。因此，结合实践，创新理论，是当代中国管理学的使命和职责。

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始创于 2002 年 12 月，经过了近 10 年的发展，目前已成为一个学科门类较为齐全、层次结构合理的综合性教学、研究单位。学院现有在读学生 1640 人，其中本科生 914 人，学术型硕士博士研究生 359 人，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367 人。专业设置横跨管理学和法学两大学科门类，分属于工商管理、公共管理、政治学三个一级学科；设有中国少数民族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北京城市民族工作研究基地、管理学案例研究中心。

在本科教育层次，学院设有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旅游管理、行政管理、公共事业管理、政治学与行政学九个本科专业。在硕士研究生教育层次，设有工商管理、公共管理、政治学三个硕士一级学科共十四个学位点，还有公共管理（MPA）和工商管理（MBA）两个专业硕士学位点。在博士研究生教育层次，有民族地区行政管理和民族政治学两个博士学位点。

学院拥有一支朝气蓬勃的优秀教职工团队，现有教职工 62 人，在专职教师队伍中，有教授 14 人，占 27%；副教授 19 人，占 37%；讲师 18 人，占 35%；90% 的教师拥有博士学位；50% 以上的教师有过留学或国外学习交流的经历；多位教师获得北京市教学名师、北京市优秀教师、国家民委突出贡献专家、校十佳教师等荣誉称号。在教学研究方面，目前承担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项目、北京市优秀教学团队建设项目、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建设项目和多项校级精品课程与特色专业等教改项目。

近年来，学院发挥专业结构交叉互补的优势，借助“985 工程”和“211 工程”建设平台，在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绩。先后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国家社科基金规划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国家民委科研项目、国务院侨办项目、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福特基金项目等重要课题 50 多项；仅近五年就发表学术论文 480 多篇，出版专著和教材 130 部，多项成果获得表彰和奖励。

学科的发展需要沟通和交流，而有效的交流必须构筑良好的平台。为了推动民族地区管理学科的发展进步，加强与国内、国际学术界的交流，特别是加强与民族地区高校和民族类高校的学术联系，我们汇聚了学院教师近期研究的部分成果，编辑出版《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评论》，包括《民族地区工商管理评论》和《民族地区公共管理与公共事务评论》两个专题；近期还将推出《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论

丛》，出版系列学术专著；并定期组织召开“中国民族地区管理学论坛”。

创新理论，关注现实，为促进民族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贡献我们的一己之力，是学院始终秉持的宗旨。使命神圣、任务艰巨，让我们携手前行，共同努力。

2011年5月28日

目 录

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

- 民族地区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与可持续发展 (3)

供应链管理

- 中外绿色供应链研究之比较 (17)
我国奶源供给外包企业经营模式分析 (27)
供应链中采购业务简易操作流程 (37)
全球化背景下供应链管理的效率和均衡 (46)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 企业人力资源外包模式分析 (55)
企业成长的人力资源战略研究述评 (64)

旅游、休闲与酒店管理

- 潜在需求市场细分的藏传佛教文化旅游产品开发研究 (75)
对我国(GB/T14038—2010)《星级标准》实施的探索研究 (86)
以中国大陆居民赴台观光促进台湾原住民旅游的策略浅析 (95)
旅游企业组织结构再造探讨 (107)
北京城市公园感知游憩容量基本空间标准研究 (117)
酒店客房收益管理定价问题研究 (127)

会计与财务

- 金融危机背景下资产定价与会计计量研究 (137)
论财务杠杆对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 (149)
新会计准则下资产减值原始凭证的规范 (156)
由上市公司财务信息造假看信息披露监管制度的完善
——基于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数据的实证分析 (162)
民族地区上市公司并购重组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1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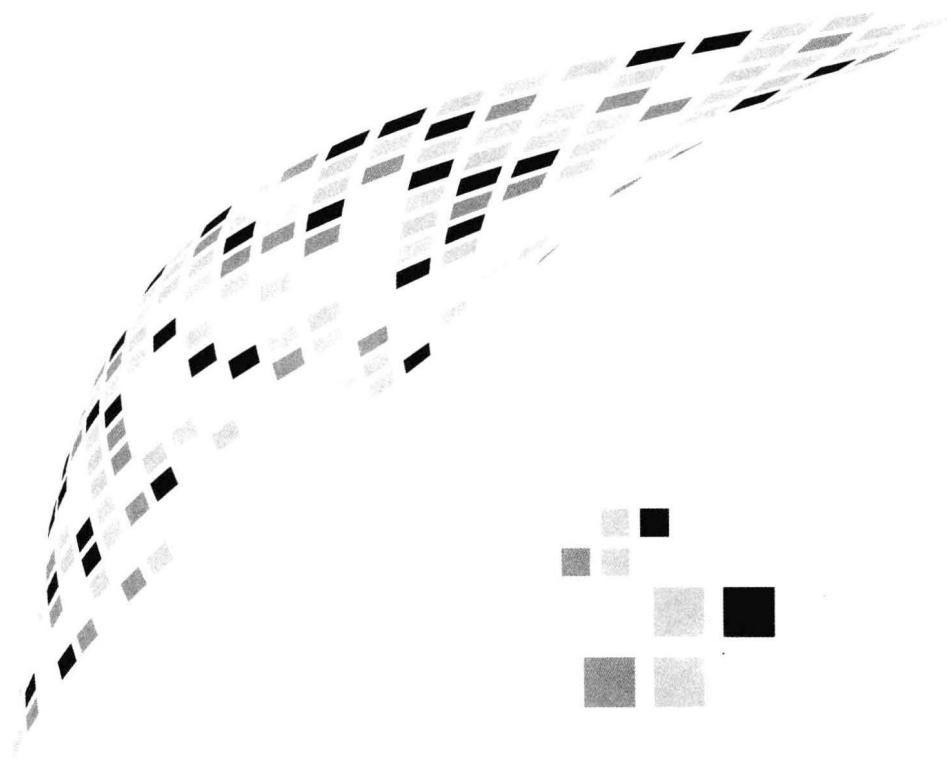
投融资管理

- 助推创意产业的三网融合战略 (189)

地方政府投融资中几个基本问题的思考	(199)
城市基础设施投资特点及引资策略研究	(204)

农业与农产品

农产品生产成本与销售价格联动性分析	(219)
农产品对接组织竞合关系研究	(228)



□ 民族地区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与可持续发展

民族地区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与可持续发展^①

李俊清

[摘要] 制度变迁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民族地区在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方面，普遍存在着诱致性因素不足或一些诱致因素会产生严重负效应的状况，而强制性制度变迁如果发生目标设定、内容和措施选择失当的情况，则会引发政府与市场错位的问题。因此，民族地区制度变迁应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导，选择恰当的变迁路径，以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制度变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以及各项社会事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截至 2008 年底，民族地区经济总量由 1952 年的 57.9 亿元增加到 30626.2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了 92.5 倍。到 2008 年，西部大开发以来民族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累计达到 77899 亿元，比 2000 年增长 5 倍。其他如道路、交通、邮电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项事业也都有了较快的发展。但是，由于诸多因素制约，民族地区的发展依然相对落后，生产总值仅占全国的 9% 左右，人均生产总值只相当于东部地区人均水平的 35% 左右，地方财政收支差达两千多亿元。目前，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和初步解决了温饱的低收入群体也主要集中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贫困发生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约有 20 个民族 390 万人贫困程度较深，贫困发生率高达 23.9%。五大自治区及少数民族聚居较为集中的云、贵、青、川四省还有约 1.6 万个行政村不通公路；新疆、云南、广西、甘肃和内蒙古还有 600 多个乡镇不通电，涉及人口 160 多万；不少地区人畜饮水十分困难，教育、医疗条件还相当落后。基础设施薄弱和生态环境脆弱，已成为长期制约民族自治地方快速发展的“瓶颈”。改变民族自治地方的落后状况，实现民族自治地方经济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维护国家统一和增强民族团结，需要多元力量的推动。通过制度创新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无疑相当关键。

所谓制度是指一系列约束和激励社会成员行为的规则，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具有非常直接的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人类发展史也就是人类社会制度变迁

^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08&ZD52）、中央民族大学“985 工程”项目成果。

史。制度变迁一般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诱致性变迁，即社会群体或个人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另一种是强制性变迁，是指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强力推进的制度变迁。目前，我国民族地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一方面国家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以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实现民族关系的和谐；但另一方面，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区域间、民族间发展差距，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其实并没有缩小，反而有扩大的趋势。因此，民族地区社会各界尤其是政府，都在试图通过大规模的制度创新以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但是在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方面，却面临着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着制度变迁的效果，甚至可能会影响到民族地区的长远发展。本文试结合民族地区政府职能转变与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对相关问题进行一些初步的探索。

一、基于社会需求的诱致性制度变迁

在制度经济学理论中，引起或影响制度变迁需求的要素有六项，其中任何一项的存在，都可能导致社会产生制度变迁的需求。它们分别是：要素与产品相对价格的长期变动、技术进步、其他制度安排的变迁、市场规模、偏好的变化、偶然事件。民族地区在过去多年里，非常注意对制度变迁需求的把握，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实现诱致性制度变迁，以减少制度变迁的社会成本。但在这一过程中，却因为对制度变迁的需求把握不足，或者内部诱致动力缺乏，而暴露了一些问题。在诱致性制度变迁中，政府所需要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而且此类制度变迁直接由社会需求引发，由社会组织完成，满足社会需求度高且社会代价也相对较小，是较为理想的制度变迁模式。但是，民族地区诱致性制度变迁却在以下几个方面受到了重大局限并引发了一些问题：

（一）技术、市场及其他制度的诱发能力微弱

近年来，学术界在研究总结东南沿海经济快速发展的成功经验时，经常把浙南和苏南两种发展模式加以对比，认为浙南的经济发展主要是由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推动，而苏南则更多地由强制性制度变迁推动。在分析浙南的诱致因素时，认为浙南地区相对较差的自然环境带来的生存压力，善于经商的传统习俗，敢闯荡、敢冒险、不怕苦、讲实效、勤俭节约的价值观等内在的地方文化是当地政府可以实现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内部条件，而1978年之后中央政府对地方控制的放松，浙南过去与海外的密切交流带来的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等则是外部因素。内外因素共同激发了社会群体追求利益的强大积极性，而政府因势利导，不断地放松对经济的限制，鼓励新的市场经济制度的生成与完善，从而进一步激发了民间的经济活力，促成了浙南经济空前繁荣，在短短二十几年里，使得浙江这个既没有区位优势，又没有资源优势的省份，人均收入从全国排名靠后一跃而成为除几个直辖

市外最高的省级区域。^①对于当前民族地区而言，外部诱致性因素与浙江有很多相似之处——国家控制放松，发达国家、发达地方产业要向内地转移。但是，民族地区却存在着内部诱致性因素不足的问题，市场狭小、观念落后、社会发展水平低使整个社会对制度变迁的需求远没有东部沿海地区那样强烈。由于地理的封闭和文化因素的影响，民族地区社会缺乏参与市场活动、追逐个人利益的激情和能力，许多少数民族群众根本无法接受高风险、快节奏的市场经营方式；少数民族群众大多注重当前的生活，重视宗教和传统仪式，而不太在意生产资料和资本的积累，在民间很难形成可观的资本力量；由于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不够完善，民族地区各族群众对市场信息的了解和利用程度都远低于其他地方，利用市场机制的能力也受到更多的客观条件限制；与发达地区相比，民族地区的企业管理者整体上思想解放程度以及能力和素质方面存在差距。这些内在的不利因素，使得民族地区政府想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来激发本地发展动力的努力往往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民族地区政府更多地想通过要素与产品价格因素，利用外部诱致因素，来实现制度变迁，但这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二）要素与产品价格引发的诱致因素具有反生态性

随着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资源、能源和其他初级产品的价格在不断上升。许多落后地方正是利用这一趋势，通过制度变迁参与全球市场，实现了本地经济的高速发展。民族地区在内部诱致因素缺乏的情况下，也积极利用当前存在的发展差距以及民族地区富有资源、能源和其他初级产品的优势，鼓励本地社会进行制度变迁以参与到全国乃至世界经济大市场中，以实现本地区的快速发展，招商引资、企业改制、大建工业园区都是这种制度变迁的表现。但是，这种基于要素和产品价格长期变动而进行的制度变迁，却给民族地区长期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

首先，外部资本向高能耗、低效益产业集中。据新华社报道，“2002年下半年以来，国内能源趋紧，高回报低投入的巨大反差，使高耗能产业一时间成为暴利行业，各国投资者蜂拥而至，西部能源富集区成了高耗能工业发展的乐园。在一些招商引资快速膨胀的贫困地区，高耗能工业已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如今，高耗能产业在我国西部能源产区出现遍地开花的发展态势。”^②这种高能耗产业集中的现象，在民族地区相当普遍。许多民族地区都出台了大量的优惠政策，鼓励外来资本开发本地资源，以换取本地经济的快速成长。尽管社会各界认为这种发展模式对于当地长远发展极为不利，希望能够改变，但是当前这些地方要寻找新的发展路径以替代这种高能耗产业，却非常困难。

^① 田伯平. 区域现代化与区域制度变迁 [J]. 江海学刊, 2003 (2).

^② 我国西部将成世界高耗能产业转移重点地 [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5-07/13/content_3213126.htm.

其次，外部资本往往投向资源密集型产业，对促进民族地区民生问题的解决作用甚微。由于外部资本进入民族地区，纯粹本着逐利目的，它们不关心当地的就业和民生问题，尽可能地回避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而政府出于引资和留资的需要，对外来资本的投向引导不力，对其社会责任监管力度不强。这使得很多外来投资投向追求短期利益的资源密集型产业，在疯狂地掠夺当地资源，剥削当地本已廉价的劳动力之后，往往形成外来资本获取暴利、政府财政迅速膨胀、经济成长指数高位运行而民生状况却没有改善甚至降低的奇怪现象。2006年5月15日，《瞭望新闻周刊》以《“富财政穷百姓”现象：“百强县”竟是贫困县》为题，报道了民族地区某地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企业、政府、百姓在经济发展中获利极度不均的现象。该报道认为，“由于大企业采用机械化作业方式，因此当地文化程度低的农民根本无法到企业就业。所以从经济上看，资源开发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对当地百姓的脱贫贡献甚微。”^①实际上，这种由外来大企业参与开发民族自治地方资源，使当地经济发展速度和财政增长速度都大大提升，但百姓却获利甚微的现象，在民族地区极为普遍，甚至在西南诸省的旅游产业开发中，对劳动力吸纳能力较强，对周边产业辐射面大的旅游企业，也并没有对当地就业和其他产业的发展有显著的推动作用，更多的情况是政府投了大量的资金修建旅游基础设施，外来资金占据了旅游资源获取暴利，而民众从中获利甚微。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借助外部诱致因素进行制度变迁带来的经济发展，不具有可持续性。

（三）诱致性制度变迁导致经济更加边缘化，进一步恶化了民族地区自主发展的环境

由于民族地区诱致性制度变迁带来的经济发展，主要是由来自区域之外的企业推动，而民族地区内部诱致因素的成长现在效果还不明显。这种制度变迁造成的发展模式，使得民族地区的经济有边缘化趋势，民族地区自主发展的环境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可能出现恶化。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民族地区在国家产业分工中处于低端，经济产出的附加值更多地被其他地方获得。在经济领域，处于产业分工高端的产业，经济产出的附加值往往更高，反之亦然。在当前民族自治地方产业结构中，处于低端的以生产初级产品为主要业务的产业占据了绝对优势，而科技含量高的深加工产业比例较低。这使得民族地区在产业分工上有沦为其他地方附庸的危险，而这种附庸地位一旦形成，将很难改变。例如，新疆是我国的棉、毛主产区，但新疆却没有几家有实力的服装设计和生产企业，而只能向东部服装产业基地供应原料，获利较低；而东部服装产业基地生产出的服装成品，利润一般要高很多。这种产业

^① “富财政穷百姓”现象：“百强县”竟是贫困县 [EB/OL].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4372954.htm>.

分工，不利于民族地区的竞争力提升。第二，民族地区产业单一，导致其在市场价格竞争中处于劣势。这种价格机制一方面固然有国家政策的影响，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因为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单一，在市场定价机制中缺乏影响力。而这种价格竞争的劣势，使得民族地区事实上处于被剥削的不利地位。第三，社会自发展能力低下导致各种资源外流，进一步恶化了当地的自发展能力。由于这种诱致性制度变迁对民族地区自发展能力的推动作用并不明显，民族地区与其他地方的发展差距在这些年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呈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使得民族地区的人才、资金等对本地发展至关重要的资源大量外流，进一步恶化了民族地区本已不佳的发展环境。

二、基于政府自觉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的需求对于民族地区而言始终存在，但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带来的发展问题也非常严重。民族地区制度变迁的诱致受到局限之后，政府习惯性地承担起了推动制度变迁的责任，从而使得民族地区整个社会制度变迁的主体日益单一化。而政府要实现制度变迁，只能利用政策、法令等具有强制色彩的工具，这就使得整个民族地区的制度变迁逐渐从诱致性向强制性转变。“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指由政府命令或法律引入和实现的制度变迁。”^① 民族地区政府采取了许多强有力的措施，出台了不少法令政策，以实现政府引导下的制度变迁，从而推动经济发展。但这一过程，仍然会引致许多问题。

（一）民族地区政府强制性社会变迁的行为

由于诱致性社会变迁可能带来诸多的不利，因此，民族地区政府在继续通过诱致性制度变迁来吸引外部逐利组织参与本地发展的同时，也采取了许多强制性制度变迁手段，刺激本地的内在发展动力，或者限制外来资本的不利影响。主要形式有：

1. 新观念的灌输

民族地区强制性制度变迁首先表现在以政府掌握的舆论资源，在社会中灌输新观念，而这种灌输往往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在许多民族地区，如果政府试图采取某种新的方式来干预经济，试图在制度方面进行创新，往往通过各种会议、各种媒体来向社会宣传政府的意图，统一全社会的思想。在宣传过程中，与新制度有着重大利益关系的企业家或者社会组织往往会被要求参与有关会议或者学习有关精神。由于政府拥有的强大资源，所以这种宣传方式对于社会主体而言，具有非常强的压力。这种通过灌输新观念从而为制度变迁创造思想基础的行为，与林毅夫在《关

^① 林毅夫. 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M]. 上海三联书店, 1994.